# 我的风雨人生路

# 目　录

一、寻根问祖……1
二、庄基房舍……5
三、童年时代……6
四、中学时代……10
五、新疆苦斗……15
六、文革时期……22
七、洛南执教……29
八、渭南从政……33
九、观点看法……37
附：诗二首……43

## 前　言

写下《我的风雨人生路》，望儿女认真一读。有些内容可以摘录，告知儿孙。

因为代差，有些观点不尽一致，也不苟同。相信绝大多数内容还是有所教益。

## 一、寻根问祖

我家祖籍陕西省渭南县白杨（寨）乡西小寨村。渭南城正西20里。西和张义村相连，东走2里是东小寨，再东2里是白杨寨。村北百米远是两丈深的土崖，渭河涨水冲崩所致。崖下是滩地，依次分为崖底下、头畛、二畛、斜畛（东西走向）、三畛、四畛。现在的渭河从三畛地中间流过，我家四畛的五亩地已经在河北了（渭河原在四畛北百米）。村南是直通渭南城的渭白公路。我家土地就在东西小寨之间，渭白路南北，直至渭河沿岸一带。这一片也是我小时候收种玩耍的好去处，印象颇深。

这里地势平坦，土质肥沃，旱涝保收。主产粮、棉、油。一年收两季。交通十分方便，有“三秦要道、八省通衢”之称。距西安一百里。是先民繁衍生息的好地方。

当地有句顺口溜：“小寨作官为宦，张（义）村骑马射箭，白杨寨黑驴驮炭”。可见小寨还是一块风水宝地。

查《渭南县志》：前清时，西小寨出一举人，叫李殿华，当过汉阳（今襄樊汉中一代）同知。这大概就是“小寨作官为宦”的缘由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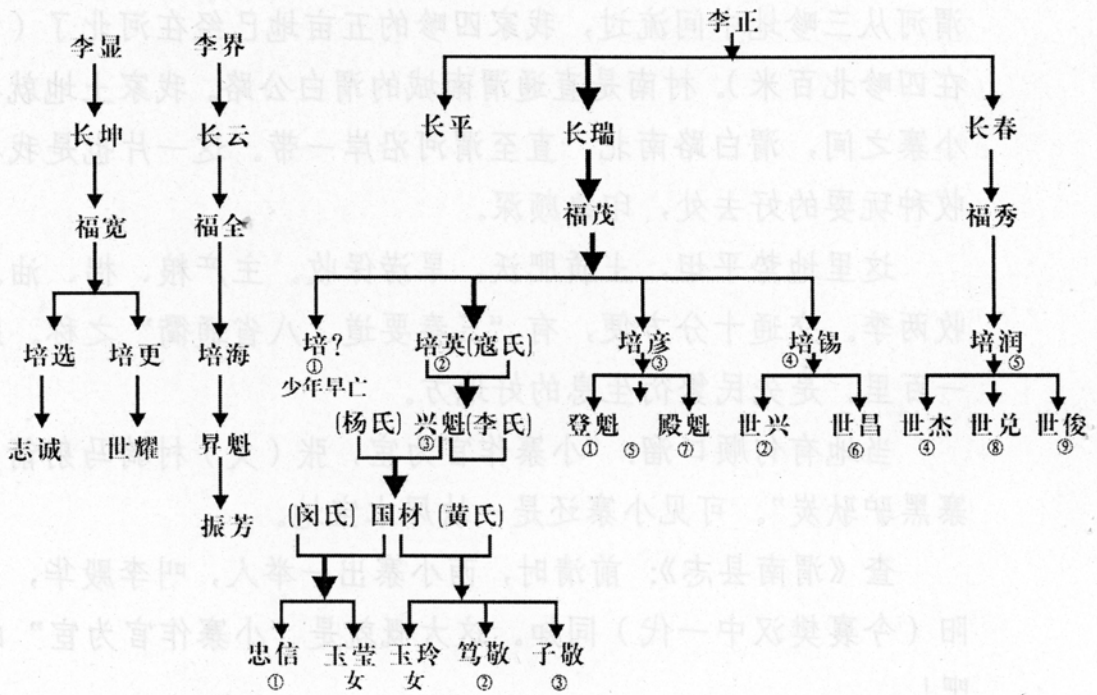
关中的村子多以“村、屯、堡、寨”命名。据说“寨”是军户。大概先祖征战有功，朝庭封赏一片土地，从此居住下来。直至解放，小寨地好，公粮反比张义村轻。

据说：西小寨是大婆后人，东小寨是小婆后人。大婆有四个儿子，所以西小寨李姓四门人。

我小时候，村里不足30户，一百来口人。全姓李，同先共祖。官坟在村子西南三、四里远，有坟园官地，柏树成荫。每年清明节，男人集合上官坟（东小寨李姓，渭南城里三马路小寨村李姓，也参加过），回来每人分3个烧饼馍，那是种官地人的义务。接着分门（族）

上祖坟。圆坟、奠酒、烧纸、磕头。大爷、四爷常给后辈讲坟主是谁，有何功德，卒年寿数。我记得有的石碑是清朝雍正，乾隆年间立的。

我们这一门族，人丁兴旺。按字辈分“长、福、培、魁（世）、国、忠”。长字辈以上就不知道了。




解放前夕，富人听说共产党来了要“分田地”，争着出卖土地，土地自然很便宜。长工出身的屈三娃、王金财、查树贤、老种、张倌等都用微薄积蓄买了些许土地。土改时，按政策都落了户口，分了房屋和田地。冯树森、薛丁保是西庆屯贫雇农，也分了我村的房屋土地（我村地主多，土地多）。因此，现在是多姓之村了。

小时候，除夕下午，挂神轴子，设香案，摆祭品，敬祖先。神

轴子上依次有各辈先祖的名讳，可惜文化大革命“破四旧”烧毁了。

祖父生于1904年，属龙，卒于1988年冬月。享年85岁。他勤劳俭朴，宽厚仁慈，和睦邻里，是一个庄稼里手。在村院中口碑甚好。他有四个姐姐，在面临绝门的情急下降生。12岁死了父亲，13、14岁就赶牛车从白杨寨码头（那时没有陇海铁路，白杨寨是渭河码头，卸山西逆水运来的煤、货）装货，结伙运往西安，挣些脚费。两年还清账债。15岁成家，16岁生子，为这个家劳苦一生。后祖母去世，独居10年，孤苦零丁，甚是可怜。

父亲李国材，生于1919年古历6月，属羊，小名“改朝”，大概因“五四”运动刚过，才起这个名字。1968年客死台湾，可谓英年早逝。他聪明、果敢、爱朋友。曾在蒲城尧山中学读过初中。16、17岁浪迹天下，吃粮当兵。1937到38年大概在山西、河南一带被日军所俘，押至东北奉天（沈阳）挖煤，不堪忍受苦役凌辱，串通3名华工，缴了日本卫兵的枪，分头逃跑。幸遇中国卡车司机同情，藏匿货箱之间，盖上帆布，逃出敌战区出山海关。九死一生，回家大病一场，后来去成都上黄浦军校18期步兵科，解放前夕，在傅作仪部当连长。北平和平解放，由秦皇岛乘轮船，经香港去台湾。

我村李远望托一个专门研究黄浦军校的朋友，查黄浦军校原档案，得知：李国材，41年12月25日——43年10月8日在成都黄浦军校上学，18期，第三纵队步兵第六队。23岁，通讯地址陕西渭南白杨寨，蒋介石兼任校长。白杨寨是个小集镇，距我家五里，父亲来信落在张义人开的染坊，由他们转交祖父。

真巧，父亲是41年12月25日参加工作，23岁；我是61年12月25日参加工作，23岁，我们竟同月同日同岁工作。

我有个表叔，叫高克俭，北赵村人，爷爷的外甥。父亲带他吃粮当兵，北平解放时同连任职。父亲当连长，他当特务长（管伙食，发军饷）。解放后回乡。从他口中，我略知当时情况：他们是机枪连，

守长城，在八达岭一带。林彪部队从东北打过来，很猛。他们向城里退。天黑，急行军，手电筒忘在宿营地。父亲让他去取，部队被解放军切断。高作了俘虏，父亲率部退到北京城。后来，高作为起义人员，在城里学习，遇见本连一位排长，才知道父亲寻他周余不见，跟一些朋友走了。几个月以后，父亲从香港写回一封信，言说在香港经商，往返九龙，经理对他很好（是否经商，很难说，家乡已解放，说经商妥当些），以后下落不明。我在瑞泉中学上学，写自传，如实叙述以上情况，从此背上父亲是反革命（文革中，中央公安六条规定，国民党连级以上是反革命）、有海外关系这个政治“黑锅”。

父亲从军校毕业，曾带回一把中正剑，一个防毒面具和一些讲作战的书籍。我曾戴过防毒面具玩。解放后，爷爷怕惹事。把这些东西处理了。怎样处理的，没直接告诉我。我影影绰绰觉得埋在牛圈里。当时牛圈在庄子中间靠南边，我没有找过。

为供父亲上学，爷爷把村东路南一块南北畛的 7 亩地卖给本村李宁人。那块地里埋着我的亲祖母。父亲曾对母亲说，日后若把事干成，要把其母坟迁回老坟。解放后，这些坟都平了。2000 年冬，母亲病危，我去新疆接她，问她日后葬于何处，她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埋在你那个婆（我的亲祖母）的墓下”。因是可耕地，大队不支持，和承包地者协商，人家不肯，未能如愿。我每年清明节，都去那一片（东小寨麻保成庄基后墙正西，囤仓苹果园房子正南，交汇处），为我的祖母上坟，父亲在天有灵，必受慰籍。

我的父母结婚的日子，正是南京政府派飞机轰炸渭南县城的那一天——1936 年 12 月 16 日。西安事变发生第四天，蒋介石被张、杨困在西安，南京政府给张、杨施加压力，武力震慑。娘家人没顾得吃二顿饭。纷纷套车跑回家。这一不祥之兆，注定他们孤守一方，终生不得团圆。

曾祖母寇氏，54 年前后辞世，高寿近 90 岁。年迈体弱，不能行走，我背着到门房下的躺椅上休息。亲祖母杨氏、张义村人，二十几岁病故。当时医疗条件很差，背部生疮，竟医治不好。后祖母李氏，78 年去世，享年 73 岁，与祖父合葬。母亲闵芝草，大闵村人，生于 1919 年古历 10 月初 10。卒于 2000 年腊月初 5（阳历已是 2001 年）享年 82 岁。父亲的骨灰一直寄放在台湾的古庙中，听台湾的弟妹说，等姨母李黄秀琴百年之后，在台湾择地合葬。

## 二、庄基房舍

我家庄基长 42.7 米，宽 10.6 米，坐西朝东。有庄基证。原来门前是一块长约 70-80 米，宽约 50-60 米的场面地，多种大麦、油菜。夏收作场，碾打麦子。现在住满了农户。听爷爷说，这个庄基是我们门族的老庄基，腰房底下的窖子噎了，才搬到后边的院子。“培”字辈分家（弟兄四个，老大没成家死亡），我的曾祖培英是老二，住进这个做马坊的院子。培彦是老三，搬到西头大爷登魁，七爷殿魁住的院子（五爷和大爷、七爷是亲兄弟，给庙底舅家过继了）。培锡是老四，留老庄，二爷世兴，六爷世昌住的地方。按此推算，我家现住的庄基最少是“长”字辈以前修建的，距今足有二、三百年了。我之所以不舍得丢弃这块故土，觉得一是“老”，风水不错；二是台湾尚有一妹二弟，这也是他们的老家呀！一朝回乡，立足父亲生长的院落，抚今追昔，自豪欣慰。

我家一直住小房（关中人称厦子房，一边流水）。曾祖搬进这个院子，上屋只有四间撅尻厦子，也开后门。隔路就进了原来的正屋。后墙上还有拴牲口的木桩子，足见这四间厦子是原来喂牲口放草料的地方。祖父陆续给中间盖了六间厦子，大门口盖了一间车房，两间磨坊，前院打了吃水井（现在井西约 2 米）。53-54 年，祖父翻修

过一次，变成对峙檐 8 间厦子。我于 98 年秋全部拆除，圈了砖围墙（私墙），盖了三间门房，两间厦子，便是现在的模样。

我盖房时，南邻家忠山说，小平盖房时，前边给他让出二十厘米，他也给我让出二十厘米（庄基讲究前窄后宽，像布袋）。我庄基够宽，不想多占，打地基时，因为南边占了忠山留的，北边留下二十厘米（到底多宽我没量过）。北邻家普凯盖房，也没向南多占，所以北边围墙东西不直。按理说，空下的二十厘米，仍属我家，有待以后修建时取直。房子盖在什么位置，我颇费了一番思索，最后决定盖在前边，后边留着，让子孙根据需要修建。

## 三 、童年时代

我生于 1939 年古历 5 月 14 日。算命先生说我是“城墙土命”，要生一辈子气。

我记事时，家中有曾祖母、祖父母、母亲和我。父亲长年在外当兵、上军校，我对他没有印象。我 6 岁时有了妹妹玉莹，她没有见过父亲面。

祖父 36 岁有了我这个孙子，而且是我们门族这一辈的老大，视如瑰宝，非常疼爱。经常带着赶集上会，买小吃。母亲也不舍得叫我干家务活，一家三代守了一个倩倩娃。从小学到高中，上学花钱祖父供给，吃穿冷暖母亲操心。我和玉莹都觉得，虽然没有父亲，但不感到为难。解放后，父亲下落不明，母亲常和祖母吵架，说父亲是后娘逼出去的，我和爷爷夹在中间生气。这便是美中不足了。

在新疆，我曾和杨登云（爷爷的外甥）叔父谈起母亲和祖母常吵架，我和爷爷为难生气之事。他笑着说：“你婆 6 份责任，你妈 3 份责任，你爷 1 份责任。”高克俭叔父也说，父亲在部队写自传，曾说在家受继母虐待。出外当兵，他还埋怨父亲：“写那干啥!”

父亲 4 岁死了亲娘，由其祖母管大。后祖母姑娘嫁进我家，面对一个 5-6 岁的孩子，会抚养吗？她干净，爱清静，未生育。有耐心吗？

怎样虐待，不得而知。母亲说："父亲在家，祖母常'牛'着不理"。抗战期间，兵荒马乱。父亲是独子，16、17 岁就吃粮当兵，家里也不缺吃少穿，不怕死吗？

北平和平解放，父亲拿了起义证，上有祖母，下有妻室儿女，他选择了去台湾，不回故乡，是黄浦军校学生，效忠老蒋？还是对家缺乏感情？

祖父老年曾对西川说："忠信他大没信了，我没法给忠信说。"这话显然有愧疚之意。愧疚什么，不得而知。母亲曾问爷爷，北平解放前夕，父亲曾写信叫她，速去北平，爷爷没让去，为什么？如果去了，母亲的命运又会是怎样？

我觉得，后娘也不好当。婆很爱我，我 5-6 岁就跟爷、婆睡。我和玉莹都是婆抱大的。村里人说，为供父亲在成都上军校，婆、妈不分昼夜，纺花织布，爷爷隔一会（5-7 天）到零口赶集卖一次。婆无儿女，省吃俭用，一辈子还不是为我们过日子。

我家土改定为上中农。当时近 50 亩地，一辆大车，两头牛。主要靠祖父耕种，间或雇个长工，没叫过短工。解放前后，打了灌井，买了水车。和启长七爷兑换了地，水地十几亩，农具齐全，小康之家。党的政策是打击地主，孤立富农，团结中农，依靠贫雇农。我家土改没受冲击。

说是小康之家，其实就是不缺粮吃，有零钱花罢了。由于干旱，缺肥，种子老化，平均亩产 4-6 斗（1 斗 30 斤）。生活仍很清苦。长年吃碗豆麦、扁豆麦面馍。给曾祖母蒸几个纯麦面馍，我也可以吃。盘里一碟辣子（盐醋和辣面子）一碟菜（生萝卜丝、咸萝卜干）很少炒菜。中秋节、过年才割 2-3 斤猪肉。莲菜、洋芋、白馍过年

才能吃到。没钱花了，粜粮食、卖棉花。再无任何收入。

祖父非常勤劳，若不雇长工，常常起早摸黑，赶天明犁一亩来地。喂牲口，垫圈、淘粮食、磨面，这些“屋里人”可以干的活，他都全部揽在自己身上。连树枝、棉花杆、包谷杆都剁得碎碎的，码得很整齐。累了，吸一袋旱烟，没活找活干。摇耧、撒种、擂麦蒌、扬场、吆车这些难度较大的农业活，他都干得得心应手。门中堂兄弟说事，常请他去。因为他正义、公平。大车、农具、钱、粮、只要你开口，有求必应。母亲也很勤劳，节俭，织棉纺布，自裁自缝。农忙下地收割，便饭做得有滋味。我的衣帽鞋袜显得合体，总比同龄人新些，干净些。

我 8 岁时就由家庭包办定了婚。媒人是四爷的妹妹麻李村“赛赛”老姑。解放后废除买卖婚姻，提倡婚姻自由，双方都没吭声。直到 53 年春天，宁效忠（白杨村人，爷爷的朋友）的女儿宁秀莹（凤莲同班同学）带我去凤莲家，才打破僵局，首次见面。以后寒暑假互相来往。凤莲读高中时，爷爷还资助她四个学期的学费，每期大概七、八十元（那时每月伙食费十元左右）。

我 6-7 岁就在本村上私塾，对杨夫初老先生（张义村人）印象颇深。他穿蓝长袍，留刷刷头，山羊胡。有学问，打板子，一边打一边说：“我报仇哩!”（意思是先生以前也这样打他），学生三、四十人，7 至 14 岁都有，全部是男生。桌凳自己带。念《孟子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七言杂志》、《新法儿童尺牍》不等。我念国文。教学以读背为主，很少讲解。字词不会可问，意思自己领悟。我上学很用心，鸡叫两三遍，被爷爷叫起来，在豆大的油灯下苦读，几乎没有为背不过书而挨打。爷爷是学校董事，定期给先生买木炭、水烟、火纸、茶叶。记有账本，年终公布。一个娃忙耙（夏收后）给先生装 2 斗麦，我们冬至敬孔子，祭品也分给学生吃，每年春节，爷爷都叫我去给老先生拜年。

我乳名叫“忠信”，取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解放后，薛建华老师改成“忠義”。“忠、孝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七个字，我占3个，西头占4个（大爷的孙子分别叫忠礼、忠仁、忠智、一个亲戚孙子叫忠孝）。周长庆（粮食局工会主席）说我的人品、德行和名字一样，名如其人。后来和台湾通信，妹妹叫玉玲，跟姊姊玉莹叫。大弟为啥叫笃敬，颇费思索。我在西安市中医二院治病，请教吴老中医，才知道《论语》上有：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，行矣；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州里行乎哉？”理解了父亲的用心，倍感亲切。心想，他们肯定是我的亲弟妹。二弟子敬跟笃敬叫，当然很好理解了。

我们兄弟的名字，带有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。暨南大学以“忠信笃敬”作为校训，规范学生的言行。那么我家也以“忠信笃敬”作家训了。

小时候，渭河经常涨水，3、5年一次，多在秋季，小涨出槽，两岸被冲成一个个高低远近不等的台阶；大涨漫滩，一片汪洋。我8、9岁，涨河了，跟大孩子一块去河边下水玩。一脚踩空，跌入二台下，上下沉浮，大声呼救，喝了几口水，被绪鸿拉上岸。从此，我再不敢下水了。

我常推“地老鼠车子”到东滩二畛地里割苜蓿，那块地5亩，南头低洼，种豌豆麦；北头3亩多是沙盖，种苜蓿，栽树。爷爷说四五百棵树，三四把粗，被炮二旅（胡宗南炮兵第二旅）一年天气伐光了。栽树不怕涨河，苜蓿是牛的优质饲料，整个渭河滩到处是树林。

人常说：“三岁记到老”。孩提时代聆听大人的教诲，常常记忆犹新。曾祖母说，她告诫父亲不要打兵，否则打仗的时候，人家会在前线打“黑子”。祖父亲说，西角他“大”昧了伙计（长工）一碗大烟土，伙计当了土匪，勾结一帮人，上房揭瓦，把老汉打死在房

子里，盖上被子，浇上食油，一把火连房带尸首烧了。母亲不识字，却能给我背一首诗："自小读书不用心，不知书内有黄金。早知书内黄金贵，高点明灯下苦心。"我们一家人都很善良本分，祖祖辈辈仁义、道德。

我五零年就可以上高小，（初小 4 年，高小 2 年，合起来叫小学），上高小要去白扬小学或树人小学。都四、五里路。要住校，背馍吃，三天回一次。52 年秋，在树人小学上了两三天，睡木楼板，吃开水馍，晚上睡不着，想爷爷，哭鼻子，干脆不上了。杨诚信（张义村人，树人学校教师）捎话叫也没去。看来对孩子娇生惯养，有害无益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！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父亲没信，三代单传，爷爷怕我念了书，日后远走高飞，不督促。直到 53 年秋才在张义小学（初小变高小，招首届高小班）上高小，55 年毕业，考入瑞泉中学初中部。

51-53 年，我断断续续上学，帮爷爷干些农业活。爷爷干活手很快，一般小伙子赶不上。晚上跟大爷（自乐班成员）到张义村看排戏，学唱戏。对秦腔有了兴趣，惭惭成了秦腔迷。不过仅是懂得板眼，能欣赏，自己唱不来。

## 四、中学时代

进了瑞中，我被编入初 58 级丙班，由于遵守纪律，团结同学，学习刻苦，成绩优良，多次被评为"三好学生"，一直当班长。为了多看书，班上组织郊游，我主动要求留下看宿舍，班主任当然放心。以致后来到了新疆，看到报刊上宣传华山、骊山，都距渭南不远，自己竟没去过，非常后悔。偏爱数学，除了课本，还看几本参考书，做很多题。不看小说，不喜欢文体活动，有"压坏板凳"的雅号。其实是高分低能，动手能力很差。

瑞泉中学是陕西省的重点中学。我上学时，挂“陕西省瑞泉中学”的校牌。校长冯金明，省民盟委员，后来当了渭南县副县长。教师多是一流的，同芳谷的代数，田增伦的几何，教得特别好。我偏爱数学就是这时形成的。当然其它课程也都学得很扎实。在新疆教书，我说我喜欢数学，不爱学语文，盛三庆（同事）说我语文功底并不差。

徐长波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，后来当了临渭区人大常委会付主任。我很佩服这个人的德行。他爱人姓涂，原籍浙江，独生女。家中老母孤身生活。80年代末，涂老师患癌症去世了。几年后，其母生活也不能自理了。徐老师把老岳母接到渭南。亲自喂饭喂水，洗澡擦身，端屎倒尿，洗衣看病好几年，直至老人安然故世。妻子死了好几年，对岳母如此孝敬，没有崇高的道德修养，是做不到的。

瑞中上学，前两年很苦。步行20里，背馍吃。星期天下午，从家带上炒面（灰面蒸熟用油炒，像油茶）、咸菜、蒸馍、锅盔，赶到学校上晚自习，周周如此，风雨无阻。开饭了，开水烫炒面，泡冷馍，就咸菜。间或上街吃碗挂面。算是改善伙食。星期六下午，下了第三节课，归心似箭，疾步如飞，妈妈饭已做好，翘首以待。“粘面”饱餐一顿。我还算好，一是妈妈做的馍麦面多，质量好；二是爷爷给的零钱宽余。记得56年秋季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倾盆大雨，我打把新买的兰布伞，背着馍，一步一滑去学校，顾了身前，忘了身后，雨水从伞上流到背后的馍布袋上，馍泡浓了，成了兰色，气得坐在宿舍床上哭。春秋之季，馍最易霉烂长毛，也得吃一个星期呀！

初中毕业，升学考试，分段录取。高分录高中，其次录中专，低分录农校。祖父是农民，不识政治风向，无能为我指点前程。我自以为学得好，看不上中专，第一志愿填报了高中，当然顺利录取了。后来，党的基本路线是“以阶段斗争为纲”。我醒悟了，后悔了。

像我这个有海外关系的“黑五类”（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）子女，高中毕业不一定能上大学。还不如上中专（58年大跃进中专学生录不够，不计较家庭成份社会关系好不好），既能减轻家庭负担（学校管伙食），又能毕业分个工作，好坏也算国家干部。

57年反右派，58年大跃进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中学生不参加反右，但我见过批判右派。一夜之间右派的房门两边贴上对联和大字报。白纸黑字，犹如农村过丧事一般。或让右派站在图书馆，接受大家批判；或让手执半截蜡烛（下午饭后，电还没来）站在凳子上，一边读大家揭发批判的大字报，一边交代问题。侮辱、斥责、漫骂，不绝于耳。师生一群围着看。陈继武鸣放最积极，第一个被打成右派，接着袁慎封、陆兴宋、向婕、姜晰、兰英民等都被定为右派。他们有的历史有污点，变成历史反革命兼右派，送进劳改队；有的是民主党派或党外人士，说了一些不利于党或社会主义的话；有的对基层党的领导人有意见，被清理下放。反右以后，万马齐喑，人人自重。没人敢讲真话。给我的教育是：“甜”话多说，形势永远大好，毛主席英明伟大，共产党绝对正确，党的基层领导没有错误。我曾经给孩子们说：“共产党有缺点，叫人家自己说，你们不能说，否则就是反党了。”

57年，我国钢产量535万吨，58年大跃进，毛主席提出翻一番，要达到1070万吨。全国人民热烈响应，于是出现了全民炼钢铁运动。瑞中停课，操场上小高炉林立。高中炼钢铁，初中浪铁砂。我班扎营双王梁村，从渭河边的沙层中挖出铁砂（渭河涨水，冲刷上游铁矿石，携带铁砂到下游沉淀，于是河边沙子中便会有一层一层薄如纸的黑色铁沫），放入脸盆，盛少半盆水，置于水面，人裤子挽到膝盖上，站入水中，用一根棍顶住盆内底，顺时针旋转，沙子随水流入河中。铁砂比重大，便在盆底积下薄薄一层。集中起来，积少成多，拿去炼铁。到底浪了多少铁砂，高中炼了多少钢铁，炼的铁能

不能用，花了多少成本，不得而知。只记得那年雨水调匀，庄稼成了，黄豆、棉花霉烂在地里，没人收割。59年庐山会议，彭德怀元帅上《万言书》，批评大跃进犯了小资产阶级狂热病，大炼钢铁得不偿失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。

这年10月，我们上东塬深翻地。好像翻得越深，庄稼就会长得越美。咋翻深呢？干脆先挖一道沟，像放崖一样向前移。岂不知表层肥土都压在成米深之下，“死”土却置于表层，这和西方国家提倡的浅耕洽洽相反。庄稼到底长得怎样，丰收了吗？没有考究。只记得生产队食堂给学生送的饭是玉米面发糕和拳头大的硬柿子。回来下雨，龙义坡坡陡路滑。为了操近路，脱了鞋子，坐在坡顶往下滑。回到学校，一个个成了水鸭子，泥旦旦。

58年4、5月，全民打麻雀，我们也停课参加了。工人、农民、干部、学生，倾巢而出。街道上、田野里、工厂、农村十来米站一个人。敲锣打鼓，摇旗呐喊。麻雀刚一落下，又被吆起。飞累了，被活捉。打麻雀破坏不破坏生态平衡，8、9亿人的中国，难道没有人提出质疑？如果马寅初的《新人口论》也遭批判，那么为什么把“计划生育”作为我国的一项国策？

58年秋季，考入瑞泉上高中，编入高61级8班，当班长，59年夏季，凤莲高中毕业，8月22日（古历7月16日）我们结婚了。

风莲51年秋入白杨小学读书。父亲教过私塾，进校就上四年级，又因成绩好跳一级，53年高小毕业。同年秋经舅父帮助，入西安市二女中读初中。56年考入西安中学读高中。西安中学的前身是延安抗大附中，是陕西省重点中学，教师一流，学生多高干子弟。她各门功课都学得很扎实，59年高考，西安市平均录分线28分。风莲没考上，政审没过关。同年11月，被新城区教育局分配到西安市三十中学当职员。60年-61年又被派往西安外语学院带薪进修俄语一年，61年秋分配到西安市五十中学当俄语教员。

59 年暑假，在西安市五中上学的李淑贤（小学同学），回乡度假，她问我："愿意不愿意去西安上学？"我说："愿意"。他爸李俊彦（本村人，比爷爷小两岁，当过许昌市警备司令国民党少将师长，掩护共产党地下人员有功，时任西安市政府参议员）给五中韩付校长（当过伪县长，俊彦的朋友）写了个条子，我便转入西安市五中继续读高二、高三。编入高 61 级丁班。班主任肖矜棣看了我的转学证很惊异，因为十来门课全是 5 分（学习苏联实行五分制），评语也好，操行"优"等，于是叫我当学习委员。61 年高中毕业。

遗憾得很，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，中学六年，竟连共青团也入不了，也没考上大学，绝非分数不够。可能因为我父亲的情况，加上凤莲家庭地主成份，其父情况，黑上加黑，政审就没有过关。

毛主席说："在阶级社会里，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段地位中生活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。"文革中被演绎成"龙生龙来凤生凤，老鼠生儿会打洞"。好像我们这些人就不能被培养、重用。本事越大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能量就会越大。

如果我能上大学，能学得更多的知识，肯定会给党和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。我不被培养上大学，不仅是我的悲痛，也是国家的不幸。

我到西安上学，把户口转到五中。高考落榜，若能及时找李俊彦帮忙，大概可以安排到西安市某工厂当工人。后来学校把户口转回农村，失去了这个机会。

在西安上学，粮不够吃。每月定量 32 斤，能吃到嘴里不足 30 斤，米饭分碗蒸，说是 2 两，刚下笼不能卖，筷子一搅就是稠粥了。师生吃完饭普遍舔碗。赵玉佩是西安市有名的中学物理教师，不光教我校高三物理，还被六中聘请教高三物理。我印象里他舔碗的姿势最幽默。很多人得浮肿病，手指在小腿上一按一个坑，半天起不来。凤莲在 30 中学也不宽余，常把省下的一个、半个馍拿来救我之

急，恩重如山，永志不忘。

高考落榜，待在家中，无所事事。张坤庆校长（我上高小时的校长）推荐，大队同意，61 年 9-11 月，我在母校张义小学当了 3 个月民办教员。从城市到农村，简陋的校舍，每月 32 元工资，教小学四年级，我不安心。

为供我上学，爷爷把 3、4 付柏木棺板卖了，一付才 80 元。给他二老留下柏木和桑木混配的，质量当然不及纯柏木了。

李琳（本村人）老汉说："兴魁供了两个都没供成"——供父亲上军校，没消息了；供我上高中，没考上大学。可见村里人对爷爷多么同情、婉惜。

在瑞中上学，有幸结识了徐正明同学：他会拉板胡，星期六晚上常相约去《新民社》看秦腔。穷学生"挂对子"（买站票，站在座位旁的栏杆外，像对联一样竖挂着），多由我买票。我们是秦腔朋友。84 年我调回谂南，他是临渭区党校校长。为凤莲调进渭南，评上一级教师帮了大忙。可怜他 60 出头就去世了。

## 五、新疆苦斗

我有一个表叔，叫杨登云。新庄村人，爷爷的外甥。父亲曾带他到河南灵宝当兵，抗战吃紧时回乡。后来在西安王曲上黄浦军校第七分校。1945 年前后毕业，分配到新疆陶峙岳部队。"九·二五起义"（1949 年 9 月 25 日陶峙岳率部起义，新疆和平解放）时任骑兵连付连长。部队整编后升为连长。他家中农成份，父兄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虽在国民党部队几年，但无恶迹，深得士兵喜爱。解放后，思想进步，聪明能干，工作有成绩，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起义人员先进典型培养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59 年当上农七师下野地管理处付处长（团级），下管七、八个团场。

61 年 8、9 月，我几次给登云叔父写信，言说高考未取，要求去新疆工作。他同意了，回信爷爷收到，藏起来，不想让我去。后来听李冠群说:“新疆你叔叫你去，咋没去？”我问爷爷要出信，做了一番安慰，于是 12 月 6 日从渭南上火车（当时火车只通到盐湖），12 月 12 日到达下野地 19 团。那天早晨，我们（我和李振民媳妇同路，她去探夫）从农七师招待所（在碾子沟）托胡付政委（胡长驻农七师招待所，叔叔给他写有便信，请他帮忙）找了一辆拉煤车，我坐在车顶，把煤蹭成一个槽，铺上帆布，曲身躺下，盖一件棉大衣。已是初冬，四野白皑皑的积雪。近 300 公里路程，汽车高速行驶，挨到 19 团下汽车，已是晚上 7-8 点钟。我浑身哆嗦，冻得说不出话来。因是“双十二”西安事变纪念日，新疆给我的下马威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在管理处叔叔家闲住十来天，12 月 25 日，管理处人事科把我分到下六场。下六场人事股分到加工厂磨面车间劳动锻炼。62 年 3 月到下六场子女校当小学教员。从此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位军垦战士。工资先是 36.14 元，3 年后涨成 38.92 元，十来年再没调过。那时白面 0.3861 元/公斤，猪肉 1.52 元/公斤，我一月能净 100 公斤面粉。

我和凤莲都是高中毕业，能有一份工作，实在不容易。她得益于西安中学马登俊。马是西安中学校长，陕北人，老革命，兼省教育厅付厅长，很牛气。西安中学高三四个班，每班 48-50 人。没考上大学仅十来人，都分配了工作，其它高中就不行。我是到新疆投亲靠友的。假若我们都没有工作，那就只有当农民了。农业社挣工分，一个劳动日三、五毛钱，那将是另一番景象了。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以王震解放新疆的部队和“九·二五”起义的部队为基础，根据毛主席“屯垦戍边”的指示，于五十年代初成立的。以后陆续送了些劳改犯，从山东、河南、上海去了些支边青年，还有部队转业的，刑满新生的。投亲靠友盲目流动的，成份

复杂。在阶段斗争为纲的年代里，各级领导根据周总理在石河子接见上海支边青年的讲话精神，口口声声说党的政策是“有成份论，但不唯成份论，重在政治表现”。其实那是给出身不好，社会关系复杂的人指一条路，让你老老实实改造自己，脱胎换骨，重新做人。成百上千树一两个典型，造舆论，作宣传。具体操作上，依靠的是转业军人和贫下中农。我大概划作盲流人员，加上社会关系不好，当然不会被重用，一直以工代干当教员。这点连杨叔父都没估计到，否则，他不会同意我去新疆。

下野地位于北疆准葛尔盆地的两南边沿，东距石河子150公里，西南距奎屯约50公里。先属农七师，因和农八师同一水系（同用大泉沟，蘑菇湖水库的水浇地），后拨给农八师。主产棉花、小麦，特产西瓜。听说还有上野地，顾名思义：“野地者，无人烟地”。50年代部队进驻，开发19团、21团（炮台）那一片地方，以后陆续成立下野地一、三、四、五、六场。加上西北方面的沙门子、小拐农场，由下野地管理处管理（管理处是师以下的派出单位，管七、八个团场）。除道路、林带、水渠、条田，居民点外，便是一望无际的土戈壁，点缀着一个个大沙包，生长着梭梭柴，红柳、骆驼刺。（新疆三大宝：棱梭、红柳、芨芨草）据说远古是海底，土壤肥沃，一料庄稼，只要有水，就能丰收。公路两旁的沙枣树，防风、挡沙，耐旱耐寒，夏天开小白花，芬芳扑鼻，秋天结果实，一串串，由绿变红，涩微甜。像野酸枣，百吃不厌，是孩子们喜爱的野果。典型的大陆性气候：“早穿皮衣午穿纱，抱着火炉吃西瓜”。我们还真把西瓜放到春节吃哩！在132团（下野地五场改称132团）2连，我们住地窝子，在九连拉冰吃，在6连去8连挑水，3公里远，雪没过膝盖，洗澡、洗衣服就更困难了。屋内有火墙，烧到20多度，室外冷到零下30多度，易感冒。房子很严实，有“针尖大的洞，斗大的风”之说，空气不好。我在加工厂劳动，数九寒天，深夜竟敢披

衣外出小解，得了关节炎。双膝疼痛一年多，后来用刚出锅的酒糟热敷，膝盖烫起核桃大的水泡，到卫生所包扎，秦国军（河南人）戏讥我“陕西冷娃”。本场政治处张主任还问我咋治好的，他也患关节炎。

我见过零下40度，甚至比这更冷，行在路上，北风呼啸，脸如针刺刀绞，只觉鼻尖发痒，不由用手一摸，竟将鼻尖一块肉粘在手指上。工人照样拉肥运沙，爬犁子上放一只柳条筐，装二、三百斤厩肥或沙子，浑身冒汗，呼气结霜。64年寒假，教师轮流到沙包拉柴禾。那天，都戴皮帽，穿毡筒、裹皮大衣，坐在拖车上，开始还又说又笑，后来冻得没人吱声。宁夏二毛子皮袄穿在身上如一张纸。装好梭梭柴，寒流来了，拖拉机在沙包里轰轰隆隆爬行，憋熄了火。驾驶员有经验，从怀里掏出一瓶汽油，麻利地浇在车头上，火柴点燃霎时烈火熊熊，我们坐在车顶上，生怕整车柴禾引着火。后来才知道一熄火，水箱就冻了，不加温，车别想发动。听说劳改犯冬天逃跑，冻流了耳朵、鼻子、手脚者有之。

62年8月，凤莲调入新疆，我们同校教书，两人80多元的工资，维持着一家七口人的生活。刚上市的瓜果蔬菜不敢问津，衣服鞋子全手工缝，大的穿了小的穿。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苇宝戴的一顶帽子是我在6连北边林带里捡的一只冻死的野猫，剥下皮凤莲用手工缝的。没给孩子买过玩具，没给孩子买过零食。李娜、苇营没上一年级，在家多带一年孩子，平时父母教一教，直接上的二年级。捡些麦子、玉米，只能喂鸡，不能磨面。没有磨子，也不敢叫人看见。即便捡的，也得缴公，弄不好会遭诬陷偷的。在4连李娜和几个女孩在连部北边捡玉米，翻一道沟，近两公里路，我去接她，满满一背筐棒子，我双手抓住一提，竟没挪动。13岁的女孩，能背成百斤，不敢想象。那时吃80%的玉米面。白面只能吃面条，定量低，男孩多，不够吃，瓜菜代，我吃过甜菜馍（甜菜切

碎拌玉米面蒸窝窝头），苜蓿馍、油渣馍。蒸豆腐渣，煮葫芦瓜。饿罪啥滋味？肚子发烧，坐卧不宁。走动好受些，岂不知更耗体力。我曾骑自行车去独山子买淀粉，去沙湾换大米，路程都在百里以上。搬一次家盖一次房。前后七八次。农忙实行大礼拜，十天一休息，去沙包拉柴禾。鸡多蛋多，能打上牛奶，孩子的身体才没垮下来，我和凤莲都落下一身病。

我先后在132团团直小学，二、九、六、四连子女校，团直中学教过书。先教小学，后教中学，先教数学，后教语文，在团直小学。领导让一、二年级老师包班（教语文、数学，当班主任），有的老师叫苦，嫌工作量重，王兴周付校长给我做工作，问我教四年级能不能包班。我说："能呀！"我认为老师更主动，语、数时间能调配，带了一学期，确实很累，但领导目的达到了。一、二年级包班再没人敢叫苦了。观摩教学，外场老师听课，总有我的份，上海支边青年毛晓平、朱乐平调到团直小学教书，分到中年级（三、四年级）教研组，我是中年级业务组长，领导叫我业务上老带新，岂不知我教书才4年。在4连学校，吴大平（初中文化）当校长，我是一般教师、教学计划，总结，经验介绍我常帮他写。成绩归他，下苦是我。

我的五个孩子都是在新疆132团出生的。李娜生于63年5月10日，古历前4月17日，中午12时-12时半，属兔。苇营生于66年8月25日，古历7月初10，早晨7时半，属马。苇宝生于68年12月26日，古历11月初7，属猴。苇林生于72年元月29日，古历腊月14日，早晨5时-5时半，属猪。宝成生于74年3月15日，古历2月22日，下午1时半，属虎。新疆荒凉、寒冷、饥饿、艰苦，被人歧视，他们都领受了。真是父母无能，儿女跟着受罪呀！其实环境艰苦，物质生活困难，也能克服。张学良的母亲曾勉励张学良说："世上只有享不上的福，没有吃不下的苦"。政治上受歧视，长

期心情忧郁也是很痛苦的。

1973 年冬到 74 年春，我带苇营、苇宝回家探亲。四爷深情地对我说："娃呀！干不大。"我能听出他话中的意思是当不上官，或当不上大官。我从来就没敢想过当官。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凤莲也于 75 年 7 月带李娜、苇宝、苇林、宝成回家探亲一次。

每当提起新疆，我便想起了杨登云叔父。他待我特别好。刚到新疆工作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给我打电话，安慰，鼓励。来下五场检查工作，叫我到场部住处面谈。生李娜凤莲在他家熬的月子。他思相进步，工作积极，艰苦朴素，平易近人等优良品质。是我学习的楷模。可怜他 66 岁就辞世了。

我们在新疆受苦，爷爷在家也不安生。60 年代初，爷爷在生产队当了几年付队长，选他当付队长是因为他懂农活，会安排生产。64 年-65 年社教，生产队的队长、付队长、会计全成了"四不清"干部。通知爷爷去县上开会。爷爷在家放声大哭。60 岁的人了，委屈悲愤到何种程度！结果赔了些粮钱了事。

中央批判习仲勋，说关中民主革命不彻底，于是社教重新补定成份，要给我家改定富农。能否定上富农，要看解放前 3 年-46、47、48 年的剥削量够不够，多亏长工周老汉和大队干部杨诚志说公道话，才免遭劫难。

周老汉，人叫周偏（sá）脑袋。周家村人，相亲（和媳妇见面）借"闯"的礼帽，戴在头上丢了，竟不知道，可见脑袋偏得厉害。他是我家 45 年雇的长工，一伙入硬叫说成 46 年。因为 46 年我家没雇长工，没有剥削。

查树正，查恒先后去给周老汉做工作，被老汉骂了回来：你们还是贫雇农哩！毛主席叫你们说假话？反正就是有女子那一年，（我妹玉莹生于 45 年 8 月，属鸡）。我打摆子（害虐疾），不能吃饭，主

人给我吃月婆子的片片馍（纯麦面、放油、酥脆）。

爷爷能评上全劳，同样种那么多地，相应地说，剥削量就少了。杨诚志曾给“闯”家扛过长工，和爷爷“钻”大的。他说：“小寨村若给兴魁评不上全劳，再没有全劳”。是呀！若不雇长工，爷爷一人要耕种 50 亩地，不是全劳，能拿得下来吗？

爷爷为人忠厚，从不欺负穷人，我没见过爷爷和别人争多论少吵过架。他平时吸旱烟，偶尔买把卷烟，我见树贤（我家的长工）有时取一两个叶子捲着吸，爷爷装着没看见。

风莲从洛南往渭南调，我找城关镇付主任种贺群（同村人）帮忙，我对她说：“你家外地人（河南濮阳人），你爸当长工，可我爷和你爸处得很好呀！”他点头同意我的看法，也办妥了凤莲安排到城区三马路中学。

好人总有好报，我家成份没变，富农定给北邻居今道家。

如果晚解放两三年，如果父亲捎些钱，爷爷买些地，那富农、地主当定了。不但分了田地，农具，还要大小运动被批被斗，人身受侮辱，全家人能受得了吗？如果爷爷好吃懒做，年年雇长工，叫短工，那富农也当定了。

父亲是解放前半年才当上连长的，作为军校学生，他升得不快，也没给家里用什么钱。好像一次寄的钱，爷爷给曾祖母买砖砌了墓。一次寄的钱，爷爷买了四畛五亩地。那时物价飞涨，货币贬值，有钱必须籴粮食或买地，否则钱更不值钱了。

玉莹妹在家亲眼看到了社教颠倒黑白，村里一伙人无中生有给我家定富农，工作组蛮横不讲理，非常气愤，对农村失去信心。爷爷也不再忍孙女在家受累受气，同意她 66 年去了新疆。还是杨登云叔父的面子，先安排到下野地五场种子队当农工，半年后调到 19 团修配厂（下野地液压厂）当工人。母亲 64 年到新疆，后随玉莹去 19 团生活。

解放后，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。土改改革，肃反镇反、三反五反、农业合作化、反右派、反右倾、社教、文化大革命。每次运动，先从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，社会关系不好的人头上开刀，一次比一次“左”。宁可屈杀，决不放过。听说57年反右，定多少右派；65年社教整多少四不清干部，要整出多少钱粮，补定多少地富成份，上边都定有指标。要完成任务，只有昧着良心整人了。西方人说：“中国人，人整人。”中国人的这一手是不是从政治运动中学会的？忠诚、纯朴、仁义、道德等传统美德都到哪里去了？

## 六、文革时期

66年暑假，全管理处中小学教师，五六百人，在管理处中学集中，参加文化大革命。学习“五·一六”通知，批判“三家村”。运用“四大”（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）互相揭发批判。难免泄私愤，互相攻击。场人事股长蔡长金亲自坐阵，詹昌宏（教师，扬州师范毕业分配）是领导小组组长，冲锋陷阵。整天学习毛主席著作、语录，开批判会，写大字报、看大字报。最怕的是红卫兵送大字报——猛不防来了，敲锣打鼓，排成一队，站在你面前怒喝一声“某某听着”，大字报展开，提几个问题，勒令限时答复，真是“左派忙，右派慌，中间派最沾光”。

随着运动的深入，有一天下午，全体教师在处部大礼堂开大会，我这个社会关系不好的人也被揪了出来。随着“把某某揪出来”的口号声，红卫兵把你压着站在舞台前，面向观众，低头认罪。并不说你有什么问题。那天被点名揪出来的最少有六七十人，大部分是历史有污点，出身不好，社会关素复杂的人，当然也有现行的。套用毛主席“他们人还在，心不死”的教导，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，让群众集中力量揭发批判这些人。我受了屈辱，辗转反侧，彻夜不

眠。第二天蒙蒙亮。就起床洗脸。模模糊糊看见南边的办公室里吊着一个人。我指给姚孟良看，姚走近一看，惊得大声喊。来了几个人卸下来，做人工呼吸，其实早死了。后来才知道是19团的赵应征老师。赵是四川人，家中地主成份。前一天下午和我一样被点名揪出来，红卫兵还勒令他交出黑日记。埋葬时棺材上赫然写着“现行反革命”五个大字。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，我本来就是以工代干教员，低人一等，遭此打击，更心灰意冷。心想：当农工一样活，还不搞文化大革命。我爷不是当了一辈子农民吗？整天丢了魂似的，我不想教书了，难道多识几个字就有罪吗？

学习班派人抄了我的家。他们翻遍了书籍、笔记本、信件，也没找出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。多亏我不爱写日记，否则，抓住只言片语，任意分析，上纲上线，就铁证如山，罪责难逃了。

运动搞了两个月，没揭出我任何原则问题，仍回9连学校教书。我耿耿于怀，羡慕农工劳动又说又笑，瞒怨学生闹派性难管理，遗憾赵应征不该教书。于是给9连指导员崔法宪写了两次报告，要求当农工劳动。现在看来，这个举措很幼稚。劳动了几年，当然比教书辛苦，职工更看不起，领导还会怀疑有其它问题。那年月，心要大，脸要厚。要相信党相信群众，经得起群众运动的冲击和考验。

在9连劳动，最苦的是跟拖车装玉米棒子和冬灌。已是初冬，风寒月冷，干霜薄雪，把玉米棒装进筐子，摔上车。车上人把筐子摔下来。一堆装完了，车往前开，直到把拖箱装满。手上裂一道道血口子。夜班饭是玉米面发糕。玉米面糊糊。冬灌浇麦，已结薄冰，睡在地上，眼望苍穹，深感人生艰难。胶筒进水，裤腿湿了，也得忍受。拾棉花腰疼，拉沙子一身汗。那时年轻，三十来岁，撑过来了。

71-72年，清理阶级队伍，连里办学习班，通知我和凤莲都参加。学习毛选《别了，司徒雷登》和有关阶级斗争的语录。不说你

有什么问题，启发让主动交待，争取宽大处理，我有什么问题可交待呀！他们干脆问我厕所出现反动标语的事。

大概是66-67年，我在9连学校教书，学校北边男生厕所出现“打倒毛主席”反动标语。王峙嵘的儿子王小华看见告诉我，我叫吴大平一块去看，向连里报案。团部保卫股也来了人，用白纸蒙住字，用毛笔按原笔迹描，然后把墙上字擦掉。从字体上看，我认为是学生蹲坑拉屎，用木棍在墙上乱画的。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开始，有的学生用粉笔、木棍在墙上乱写“打倒×××”、“毛主席万岁”。也许刚写“打倒”、又写“毛主席万岁”，没写完，或把二者重叠一起。字无体，迹不清，说不清什么动机，怎样形成。我如实说明发现的经过。他们把我从管理处集训回来写报告，不教书，与厕所出现的反动标语联系起来分析，结合社会关系，怀疑是我所为。谁能知道我为啥不教书，我真是没事找事哩！

我对自己有一个基本估价：我是解放后共产党一手培养起来的青年学生，一贯思想进步，热爱共产党、毛主席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。学习刻苦努力，工作认真负责，骨子里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细胞。可是党总不信任我，好像把我向对立面推，我心情忧愤。

我和凤莲都感叹，我们的父亲错走了一步，竟给儿女留下如此大的灾难，30年抬不起头。

我性格中的逆来顺受、唯唯诺诺、缺乏男子汉阳刚之气，爱和老年人在一起叙谈，守旧等性格，大概是长期生活在一种政治氛围中形成的。

还有一件事，想起来真后怕，我在9连劳动，指导员、连长常叫我帮他们写一些讲话稿、批判稿。林彪“九·一三”叛逃事件后，团里要开批判会，指名崔发宪发言。都晚上9点了，崔把我叫去，交代了任务，并叫我到团部组织股（也可能宣教股）取一份中央传达林彪篡党叛国罪行的文件做参考。我拿到文件，顺便装进上衣斜

开的口袋、骑自行车返回，不知不觉将文件掉到团直小学门前的林带边。前行一里多路才发现，顿时毛骨悚然。多亏明月高悬，夜静人稀，顺利找到了。中央绝密文件，如果找不到或落到劳改、新生人员手里，给我上纲上线，该当何罪呀！

政治上受冷落、歧视，必遭小人陷害、欺负。一次，我在马号东边浇水，安瑞祥（外号安流氓）巡渠看水。他顺便在龙渠上开个口子，不压草，口子越冲越大。水大当然浇地多，我忙得不亦乐乎，他不体量，余水多，没法处理，流到地头的沙包里，反给我开批判会。李麻子（贫农、浇水班职工）后来说："哪里跑水啦！"意思是我没有过错。我和安瑞祥一无怨二无仇，他陷害我，是为了树个靶子，杀一儆百呢？还是把我欺负一下，就觉得更忠于党和毛主席呢？

辛修宇（9 连合作社售货员）为孩子之间纠纷，打李娜耳光，我还是他娃的老师哩！不过那时不教书了。我离开 9 连，就听说这个人死了。

在四连，宝成出水痘，蔡立秋是卫生员。对有脸面的人，他跑得很快，像指导员家的私人医生。我叫给娃打针，他打扑克，三番五次请不动。娃的脸都憋青了。送到卫生队住院，宋医生把凤莲狠狠训了一顿，说再晚送来，就没救了。

在 9 连，李玉忠公然叫我"台湾儿"。凤莲和他吵，他冲进我家，我挡住说理。凤莲瞒怨我没有和她一起把那"二逑"关到我家揍一顿。

在那个年代，宁叫人欺，勿惹事生非。"只许你老老实实，不许你乱说乱动"。给你找事还找不到哩，巴不得你蹦出来表演一番。

王峙嵘，伪军队"司药"。王爱龄，地主成份。平时尾巴夹得不紧，高喉咙，大嗓子，说风凉话。四、五十岁了，清队中叫打土块（砖坯），干最重的体力活。

我从 19 团李振民那里借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，听了成个月，有

人诬陷我听敌台。我给儿子起名苇营，他们说是“伟英”的谐音，诬蔑我对英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不恭。文革中，曾有一段时间对人的姓名分析批判。譬如“张巨福”，你还想享大福，剥削人。这些东西，从哪里学来的？后来看一个材料，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：“你还叫彭得华（彭德怀小名），想得中华，野心不小！”康生把这一手学习运用到了极致。

66-68 年，我倒霉到了极点。67 年我的二女儿李丽娟患爆发性肝炎在管理处医院夭折，不足 3 岁。68 年父亲因中风病故台湾，不到 50 岁。父亲若北平解放回乡，文化大革命也少不了揪斗，多少名人志士都是那个年月自杀的，好像他的寿数是命中注定，在劫难逃。

所幸的是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部队编制，部队管理。文化大革命始终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，掌握政策、执行政策比较好。清理阶级队伍，张长春是驻 9 连的工作组，没搞逼供信。我没关牛棚，没挨打。平时尾巴就夹得紧，领导的印象还不错，没叫打土块。

有时平心静想，刘少奇、彭德怀、贺龙、陶铸这些老革命，一个个都被整死了，我个平民百姓，区区小卒，受点委屈算什么？

杨登云叔父也被打倒了，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被批斗监督劳动，还戴高帽子、挂黑牌子游街。我就怀疑，“九·二五”起义的，不分青红皂白，都是国民党残渣余孽？起义时只要放下武器，弃暗投明，都是革命的。这些承诺，过河拆桥，不认帐了吗？我曾安慰他：“再难都不能自绝于人世”。他说：“ 那就说不清了”。他是首批“解放”的干部，调到 129 团（高泉农场）又从团付参谋长一路干到团长。后来又调到 131 团当团长。他这个人，那里落后，调他去，准能旧貌换新颜。这样的干部也逃不脱文革初期被冲击的厄运。

文革中有些事，现在看起来很可笑：

①开大小会，都要“三敬祝”——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！敬祝

林副主席健康长寿！敬祝江青同志永远健康！学习《毛主席语录》根据会议主题，选学有关内容。

②唱“语录歌”——用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。跳“忠”字舞——集体舞。边跳边唱，歌诗是：“敬爱的毛主席，我们心中的红太阳，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，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。千言万语，汇成一句话：“祝福您毛主席万寿无疆”。

③早请示，晚汇报——站在毛主席像前、早晨请示、晚上汇报当天干的工作，象在神像前祈祷一般。

④毛主席像章胸前戴，王祥林戴的那个直径有二十厘米。

⑤谁知道王恩茂（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）是光脸还是麻子，一派要打倒，一派要保，常常打起来。奎屯武斗学生被打死，埋在广场，临死还握着红宝书——毛主席语录。夫妻观点不一致闹离婚，有的是。

⑥抓生产就是“唯生产力论”，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”。

⑦半夜集合，传达“最高指示”。有一次传达的最高指示是“不要吃”。（某国首脑送给毛主席的芒果，毛主席交待工作人员：“不要吃……

⑧破“四旧”（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传统、旧道德）不知毁了多少文物古迹，康生授意谭厚兰带红卫兵把山东曲阜孔府砸得一片狼藉。

⑨家家屋里、门窗上、墙壁上贴满了毛主席像，好象贴得越多越热爱毛主席。

⑩结婚送礼多是整套《毛泽东选集》。《毛主席语录》人手一册。开大会，呼口号，举语录，一片红。

在我党的历史上，曾有过两次“造神”运动。一次是“七大”，刘少奇提出“毛泽东思想”的理论。后来苏联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，

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。“八大”时邓小平作《修改党章的报告》，把“毛泽东思想”从党章中删除。这是大多数中央领导的意见，却成了邓小平反对毛主席的铁证。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，林彪把毛主席神化了，提出“毛主席的话，字字是真理，一句顶一万句。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”。这就导致了党的民主生活不正常，集体领导被破坏。越来越“左”，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造成了很大损失。

五七年反“右”以后，党外万马齐喑。五八年大跃进，农村小伙子“放卫星”。看谁的产量定得高。提出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高产。”你说你一亩地能产十万斤，我说我一亩地能产二十万斤。爷爷算了一下，定那么高的产量，光麦粒在地里能堆一尺厚。浮夸风导致了60-62年的大饥饿。五九年反右倾，批判“彭、黄、张、周”党内从此噤若寒蝉。文化大革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，没有人敢制止，敢批评。有远见的人要求孩子上山下乡，不忘看书学习。78年恢复高考，一个个考上大学走了。

文化大革命，中央彻底否定了，叶剑英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的讲话中指出：“文革死了两千万人，整了一亿人，浪费八千亿人民币”，有人总结说是“十年浩劫”。有人说：“法律被践踏，人性被湮灭。”有人说：“拈草树为刀兵，指骨肉为仇敌”。

群众运动，运动群众。出现了过激行为，被整的人要谅解。群众运动嘛，还能不出偏差？落实政策归共产党毛主席，永远感激党和毛主席的恩情。这已经是历次运动中的一条普遍公式。我们家乡的姚黑南、刘子晋都是运动中被枪毙的，后来政府给平了反。

听说粉碎“四人帮”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掌权，邓小平复出，我们非常高兴。

陈云首先提出：“毛主席是人不是神”。邓小平领导了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的大讨论。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《关于党

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，纠正冤假错案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“改革开放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上来。我们这些家庭出身、社会关系不好的人，再不提心吊胆，被人欺负。焕发了青春，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。

我在新疆，所以一直很安心，一是杨登云叔父教育、鼓励，给以温暖；二是我和凤莲都只求活命，没有奢想；三是拖家带口，要为孩子负责。熬了18年，总算有工作，城镇户口，商品粮。调回陕西，我对亲友、老同学说：“没有死，带着五个孩子回来了”。

## 七、洛南执教

78年古历5月初五，祖母拾麦子回来，突发高血压中风，卧床不起，不省人事。接到爷爷的电报，我很快回家探亲。月余，祖母病故，办完丧事，我去洛南看望老姑母和果凤山姑夫（老姑母家住张义村。爷爷的二姐。新庄是大姐，大闵村是三姐，北赵村是四姐。我只见过二、四老姑，老大老三过早故世了）。

果凤山是东北人。14岁参加革命，时任洛南县体委主任，朝鲜停战，志愿军回国，驻扎在张义村整编，他是连指导员。和老姑母小女儿杨若侠结婚，招赘为上门女婿。老姑母中年丧夫，三个女儿，我的祖父帮助耕种。现在祖母去世，祖父孤身，他们是外甥，离得近，难免要多操心。

母亲曾对我说，父亲17-18岁在河南当兵，开小差，被抓了回去，人家要枪毙。当时杨若侠的父亲也在这个部队，当文书。向连长哀求说：“这娃他大就这一个儿了，杀了他，这个家就绝门了，花了些钱，救了父亲一命。

我想调回渭南工作，离爷爷近一点，好照顾。果凤山姑夫一家都同意，但我离开渭南已18年，没熟人，调不进，没办法。时逢拨乱

反正，振兴教育，洛南是山区，缺教员，果凤山推荐，文教局张生智局长同意，给132团发了商调函，新疆方面，杨登云叔父找了他的老上级——农八师杨新三副政委。当时邓小平即将访美，声言教训越南，防苏突袭新疆，战争气氛浓烈。中青年严阵以待，做好临战准备，老人小孩疏散内地。人事调动冻结。记得杨副政委在我的报告上批下："特殊情况，按特殊情况处理。"获准放行。十一月份就在团里办完了手续，团直中学庞有树校长硬叫我把那个学期教完再走，她的女儿在我班读初三。为了工作，我觉得他也不过分。因此腊月底才动身，在火车上过的春节。

我和凤莲被分配到工农中学当教员。该校位于洛南县城以东5公里，洛河西岸。旁边是国营704厂，厂方投资修建，行政归兑山区管理。既有工人子弟，又有农村学生，故谓工农中学。分小学部、中学部，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班。学生一千多，教师近百人，设备较好，比农村中学气派。

当地农村很穷，学生很苦。说有学生灶，一天两餐饭，顿顿是玉米糁糊汤。不蒸馍，不炒菜。开饭了，打碗糊汤，泡从家里拿的包谷面馍，就白萝卜缨子窝的浆水菜，有的学生老喝糊汤没有馍。苇营在洛南中学读了三年高中，也吃的是这样的伙食。学生上学过洛河，平时踩列石，河一涨，就得淌水。深秋淌水，两腿皴得像榆树皮。凤莲班上的西沟学生席德胜就是上学淌水淹死的。河宽几十米，涨水流速急，连尸首都没找到。苇营和王勇、权琨住在铁厂，到洛中上晚自习，走3里路，过一条小河。一次，苇营踩列石一只腿滑入水中，棉裤湿到膝盖上，硬撑到下晚自习回家才换。没有坚强的意志，没有吃苦的精神，是绝然做不到的。

我们住在校园内操场旁边的柏树院。一家七口，两间房，总共16到17平方米。一口大锅，烧柴禾。想吃肉了，买个猪头。一是便宜，猪头价钱不及猪肉一半，十几斤的猪头，骨头才一斤多。二

是人多，两三天就能吃完，放不坏，学校三分之一是民办教师，我们虽穷，但不十分显眼。

寒暑假，回渭南，坐汽车。130公里，票价3.1元，却买不起。常托学生家长在704厂找便车，肯坐张文昌师傅的车。时间长了，找便车都不好意思了。

81-82年暑假，我和凤莲回渭南，孩子留在学校。苇林打摆子，发烧40℃，李娜带到704厂卫生所，多亏赵大夫、黄大夫、魏大夫关心治疗。尤其赵大夫一直守着苇林。把李娜吓坏了。

我教初中语文，凤莲教初中数学。都教两个班课，当班主任。工作分量重，是学校骨干教师。尤其是我，思想压力很大，年年带毕业班。别人初一、初二教得咋样，没人看见，升学就看初三教师了，初三四个班，把成绩好的学生编在一个班，叫快班。我总教快班语文，当班主任，还要教一个慢班语文。学校把升学的期望寄托在我身上，学生、家长、教师、领导，都拭目以待，书把我教怕了。

在工农中学，我一边教书，一边努力提高业务能力。系统地看了一些《语法修辞》、《古文译注》、《作文点评》等书籍，研读特级教师的教案，听教师进修学校老师讲课，收获很大。学生时代，偏爱数学，如今逼上梁山，重修语文。无论知识范围、教学方法，都得到了充实、提高。慢慢地觉得能够胜任初中语文教学了。

我对初三快班的语文教学、班级管理抓得很紧。晚自习跟班。星期天主动给学生补课，从未收过补课费。复习提纲、模拟考试题，编了一本又一本。704厂晚上露天放电影，看完电影备课、批改作业，常常熬夜到下一两点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一份耕耘，一份收获。我和李兴民搭帮教毕业班四个班语文，升学考试在兑山区名列前茅。82年获全县第一，我班学生张自平中考语文百分卷得93分，是全县最高分。

因为成绩显著，83年6月，我被商洛地区教育局抽去参加中考

《语文试卷》、民办教师转正《语文试卷》的命题工作。住在华阴县城，随后游览了华岳庙、白马寺、少林寺、龙门石窟等名胜。

严格地说，我不是一个称职的语文教师，不会说普通话、方言重，有些字音读不准。我凭的是工作扎实，认真负责，我认为一个教师，一要业务能力强，二要工作态度好。我常说："教学工作，贵在扎实。"

我认为：一个学生，在求学阶段，若能碰到一个好教师，是万幸。

李娜、苇营、苇宝都是我教初三语文毕业的。

我和凤莲都当教师，工作不洋火、不被人看重。但孩子基础课学得扎实，没荒废，日后都考上了大学。比起同事把别人的学生一个个送进大学，自己的孩子却考不上，要安心些。

在工农中学，我多次被评为先进教师。我工作扎实、认真负责给洛南县教育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

我努力工作，无所求。我常说："生就的牛，就得吃草。"张振西（同事）常戏称我"李牛"。只要有人性，有良心，就得扎实工作，且不高唱"为人民服务"，就是将心比心，推己及人，别人教我的孩子不负责任，我也很气愤啊！误人子弟，罪孽深重。我多年来就是怀着这种朴素的感情，对待教学工作的。

工农中学校长尤志谦曾说："教书的人，一辈子熬了八辈子的眼，一辈子说了八辈子的话，一辈子生了八辈子的气。"是的，教书确实辛苦，只要你持认真负责的态度，永远有干不完的活。

我同情可怜娃。在工农中学，我班有个西沟学生刘建良，一只手已被粉碎机轧断。我在班上宣布："刘建良不打扫教室、清洁区"。有的学生离校远，我批准不上早操。对一些调皮学生，我有时气急了，也动手动脚，但学生普遍评论我"心底好"。

从新疆到洛南，我教了将近20年书，扪心自问，我对得起学生、家长。当然离党的要求，还有一定距离。

在洛南，我的霉运熬到了头。79年夏季，李娜考上了中专，上

了西安电力学校。我们把李娜亏待了。孩子多，经济困难，为了早就业，减轻家庭负担。如果让她上高中，估计也能考大学。我的工资也理顺成教师级别。从此，再不被人下眼观看。84年，苇营以全县第6名、高出陕西省高考二本分数线66分的好成绩，考上重点大学。给弟弟们开了个好头，予以莫大鼓舞。

追寻我走过的路，我和国家同命运，紧相连。国家受极“左”路线干扰，“四人帮”狂獗，我受冷落，受欺压。国家拨乱反正，改革开放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我扬眉吐气。我感谢“邓青天”。邓小平三上三下，没有死。这个人不能死，这是天数，他死了，谁给右派平反？谁能使全国人民吃饱了，自由了？天无绝人之路啊！

提起洛南，我怀念果凤山姑夫。他帮我调进洛南，当时兵团农垦工人吃自给粮，有的大城市不承认是商品粮。他通过城关镇张书记帮我们全家顺利安上了城镇户口，商品粮。我也帮他把小儿子杨锋调进渭南。可怜他68岁病故了。

## 八、渭南从政

在洛南教书，仅寒暑假能回家照顾爷爷。老人仍很孤独，我决心调回渭南。

我通过在省公安厅工作的七爷的儿子李维圣，认识在渭南油脂厂工作的他的老战友高全升，高全升把我的情况介绍给粮食局人事股长周长庆。当时，粮食局在明光峪粮库办了一所粮校，无编制，隶属人事股管理。农闲时对系统职工进行业务技术培训。83年以前，上边重视，还办得红火。到84年秋，教师有的上电大，有的当医生，周长庆考虑我是中学教师，二十几年的教龄，粮校正好缺人，同意接收。

仅有接收单位还不行，我又通过亲戚杨景怀找劳动人事局局长高耀恒，同意调进渭南，84年9月1日，我到渭南粮食局工作。

我搬家住在粮校，粮食、户口、工资关系在局机关。白天去粮食局人事股上班，帮别人干些工作，晚上住在粮校。可能领导在考验我，85年5月才明确编入人事股，当宣传教育干事，住进机关大院。

我把苇宝、苇林带回渭南上学，求田增伦老师帮忙，苇宝入瑞泉中学读高一（苇宝中考被洛南中学录取，有录取通知书），苇林入育红中学读初二，在粮校住了八个月，实在苦了苇林。他中午放学去瑞中找苇宝，一块去伙房买饭，下午放学回粮校，自己生炉子下挂面。我6点下班骑自行车回到粮校已快7点，苇林的饭已做熟了。我们的晚饭多是菠菜挂面和我从粮食局买回来的馒头。我一天到晚忙忙迫迫，师家智叫我“李紧张”。

进明光峪粮库到粮校，要上一个斜度为30-40度，长60-70米的土坡，上到坡顶，气喘吁吁。如果下雨，路宽不足一米，滑倒是小，弄不好会掉到崖底。我曾经滑倒过好几回，多亏路旁的酸枣树，可挡可攀。

宣传教育干事协助股长管23个基层单位的宣传、职工教育、精神文件建设工作，兼任工会干事，负责机关政治学习。和政府对口部局经常联系。年初写计划，年终写总结，写经验介绍材料。平时开会，上请下达。我是中学语文教师，拟文、写材料质量上乘；办教育，是内行；加上吃苦耐劳，认真负责，所管工作常被对口上级评为先进，我也因此受到奖励。

最劳神的是办培训班。平时粮校锁门，要办班了，从基层抽几名大中专学生当教员，或聘请机关股室干部兼课。仓储、购销、财会专业都办，时间半年、一月、半月不等，我作为粮食局指派的负责人，既管教师、又管学生；既管吃，又管住；既是没任命的校长，

又是教课的老师。作计划，写总结，买设备，常常忙得不亦乐乎。都是成年人，粮食职工平时就纪律涣散，求知欲不强，文化程度不一，个别单位派来的是“死狗烂娃”，很难管理，常生气。

最苦的是给领导写材料。在机关工作，没背景，没后台，想长期待下去，就得业务能力强，工作有成绩。评上了先进，领导开会介绍经验，主管干事又得拿出质量较高的材料。写这样的材料很费心，要有理论，有事实，有具体做法，有丰硕成果。看文件，列提纲，打腹稿，起草，修改。常常几天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，有时熬个通宵。字斟句酌，一丝不苟，写成的材料领导几乎没有改动。

尽管如此，我觉得在粮食局当干事，比我在工农中学教书轻松多了，教书是天天忙，压力大，行政上是阵阵忙，压力小。

1986 年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介绍人是周长庆、同渭文。吸收我入党，是因为再不提“阶级斗争为纲”了，不纠缠我的社会关系了；为人诚恳，工作扎实，表现好；便于阅读，处理宣传组织等党委部门的文件，从此我的政治地位也提高了。

85 年 11 月，凤莲调进渭南，入三马路中学当教员。86 年李娜从商洛供电局调入渭南供电局。我们一家又团聚了。从 84-86 年，3 年时间，我、凤莲、李娜先后调进地级市渭南城，并且单位都不错，粮食局职工议论我老李不知有多硬的后台，多大本事。天哪！我有啥后台，啥本事？大概是“没有眼的虫虫天看见”。

贫寒出秀才。苇宝、苇林、宝成分别于 87、89、91 年从瑞泉中学高中毕业应届考上大学。李娜也取得华北电力学院大专文凭，大家都很羡慕，老同学卢秦田称我是“大学生专业户”。

我和凤莲没上大学，绝非成绩不佳。国家不培养，有啥办法。我们早就立下誓言：“国家欠我家两个大学生，要还四个大学生”。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。

我没考上大学，几十年不登考上大学同学的门。孩子们都上了大学，慢慢地也和他们有来往了。觉得能站在人前了。记得我刚调回渭南，第一次见胡志信（初中同班同学），他指着我的鼻子说“就你那时学得好，就你没出息”。

我社会关系不好，工作以后，从不和领导靠得很近，生怕别人说领导阶级阵线不分明。也不和出身好的同事深交，生怕玷污了人家的大“红”。我凭的是业务能力强，为人诚恳，工作扎实。

在粮食局工作，陪领导下基层，受人尊敬，也能帮同学、亲友买些大米、特粉。显得人有了价值。看不惯的是：盲从领导，以权谋私，另眼待人。师家智和我开玩笑说“教师分米数颗颗，分油数点点”。无非讥讽教师小气，但说明平等，总比强权政治，弱肉强食，叫人看着舒服些。

在粮食局工作，我从不以权谋私，吭害百姓。职权范围以内，只要不违反政策，尽量给人解决。我同情弱者，因为我长期身处社会底层。

94 年 9 月，我刚满 55 周岁，响应党的号召，从粮食局离岗，为党工作 33 年，终于卸下套来。我是党和国家的一头牛，“吃的是草，挤出来的是牛奶、血”，我期望国家能再养活我 33 年，我觉得不过分。

33 年，提心吊胆，没犯过错误，没劳改，是万幸。

我对前半生作过小结：劳累过度，营养不足，怀才不遇，心情忧郁。

我常警告自己，不能自杀，我还要埋葬爷爷、妈妈，我要对孩子们负责。

“天意怜幽草，人生重晚晴”。87 年，我患了肝病——乙肝病毒携带者。气郁乏力，眼圈青，很难受，98 年竟奇迹般治好了。产生了抗体，表面抗原转阴，人也不觉得难受了，可以安度晚年了。

99年6月，我满60周岁，办了退休手续，闲暇无事，重操旧业，给学生补课，发挥余热。

在粮食局工作，我记申志明局长的好处。88年冬月，祖父去世，办丧事，他念我孩子多，经济拮据，两次找我谈话，叫我写个报告，组织给我照顾200元（可能300元吧，记不清了）。我自参加工作以来，只知勒紧裤腰带过日子，从来没向组织伸过手。记得我在报告中写着“一贯节衣缩食”的文字，申局长看后深情地说“可节衣，但不要缩食”。

87年，我通过李玉亭（本村人，国民党少将），托他在美国的朋友从台湾查知我的父亲曾在台湾南投县居住过，68年去世，姨母李黄秀琴携一女二子去高雄。闻之，非常悲痛，祖父耄耋之年，不能告知。90年经杨亚铁（父亲舅父之子，黄浦同期同学）叔父与台湾黄浦同学联系，终于收到了玉玲妹用血泪写的回信和全家福照片。信中有“我们也惭否极泰来”一句，印象至深。概括了两个家庭四十年来的境遇。后来通过书信知道父亲到台湾后，先在军界近十年，官至上尉，转业后到中学当教务主任，中风死亡。我把此事告知母亲，她说：“不怪你爸，单身十来年，很可怜，成家也应该”。渭南省四建郭猛去台北探亲，我给姨母写了一封信，托他去高雄面交，谈谈我们的情况。姨母弟妹热情款待。姨母拿出两万元新台币，托郭从台北兑换成美元（约七百元）说是给我一半，给我母亲一半，非常感激。

## 九、观点看法

我是农家子，风风雨雨几十年，耳闻目睹许多事，对人生感触甚深，写出来，共同体味。

1、人生三件事：一是事业有成就，不枉人世走一回；二是孝敬父母，报答养育之恩，此乃人非禽兽也；三是教育子女成才，确保后继有人，家业永远兴旺发达。第一件，靠雄心。自强不息，英勇奋斗，审时度势，攀登高峰；第二件，靠良心。要知父母恩，怀里抱儿孙。第三件，靠耐心，思想重视，耐心引导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外因促使内因起变化。

2、我相信善恶有报，当代不报下代报。从理论上讲，符合平衡原理。自然界始终维持着一个大平衡。你看，日月运行，斗转星移，相吸相斥，周而复始。人口增长，生男生女，全国比例，基本相等。生物界相生相克，生态平衡。根据这个原理，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间不到，时间一到，一切都报”。应该是存在的。从实践上讲，我村几十户，排门数，凡上辈做恶，下辈没有好过的。农村人说“一辈做官，三辈挨砖”。“先人的积德，坟里的风脉”。佛门讲“爱出者爱返，福往者福来”。都是说“平衡”这个道理。因此，要“以善为本，以诚待人”。“忠厚传世，诗书继家”。弘扬真、善、美，憎恶假、恶、丑，为善最乐，积德必兴。

3、政治是无情的，政治不论理。政治是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。任何阶级的政治都是维护本阶级的经济利益、建立和巩固本阶级的统治为目的。五七年，毛主席号召帮助党整风，大鸣大放。做到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；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；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”。结果给党提意见的一个个被打成右派，实行专政，全国55万，毛主席称反右是引蛇出洞，让毒草滋长起来，然后一一锄之。阴谋也好，阳谋也罢，一臭就是22年。（57年打成右派，79年中央给平反）人生有几个22年？“六、四”学生运动，我就告诫苇宝，共产党培养的大学生，绝不会叫你去反对共产党。可能任何政党都会这样。当你的言行对他的政权造成威胁时，都会镇压。因此，要始终保持清

醒的政治头脑，自觉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。不能与专政机关唱反调，在政治上犯错误。

4、母爱是伟大的、无私的。没有母爱就没有繁衍。我的母亲25岁守寡，不为解放后提倡婚姻自主所动，用她的话说“让儿女进门有一声‘妈’叫”。岳母30几岁，上有两代弱妇人，下有五个儿女，贞节操守，历尽艰辛。凤莲对她的儿女也是含辛茹苦，废寝忘食。母亲是家庭的核心，是家庭的凝聚力，没有母亲这个家庭就散了。因此，每当我听到谁对其母不孝，就很鄙视，很气愤，经常吟咏孟郊的《游子吟》：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。我还读过孟郊的一首游子诗“萱草生堂阶，游子行天涯；慈母依堂前，不见萱草花”。

5、偶然+偶然=机遇，机遇+能力=成功。机遇就是命运。人之命，天注定。杨振宁和×××都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理工尖子，同被派往美国留学，学成以后，×××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血，毅然回国。57年被打成右派，杨振宁和李政道却在57年获诺贝尔奖，这就是命运。在人生的长河中，会有某段时间背时背运。鲁迅先生有“运交华盖欲何求，未敢翻身已碰头”的名句。我爷老年孤独，我妈女人羊（属羊），泪汪汪一辈子，我就在新疆18年，饥饿劳累，心情忧郁，天不佑之，时不合之，有什么办法？唯一办法就是忍耐、抗争。把心态调整好，坦然处之。老舍不死能看见粉碎“四人帮”，赵应征不死也能平反。死了给父母、子女造成多大的伤害。世上没有转不过去的路，却有转不过来的心情，关键是个心情。这里讲一个故事，1962年秋，郭沫若来南海普陀山游览，在潮音洞拾得一个笔记本，扉页上写着一联；“年年失望，年年望，处处难寻处处寻。”横批：“春在那里？”再翻一页，是一首绝命诗，署着当天的日子，郭老看后很着急，马上叫人寻找失主。结果失主是一位神色忧郁，行动失常的姑娘，叫李真真，姑娘三年考大学落榜，爱情

也遭受挫折，决心魂归普陀。郭老耐心开导，将扉页上一联改为“年年失望年年望，事事难成事事成”。横批：“春在心中”。姑娘看后感佩不已，虽不认识郭老，猜想一定有学问，于是把自己的心事倾吐出来。郭老听后，奋笔书赠一联：“有志者，事竟成，破釜沉舟，百二秦关终属楚；苦心人，天不负，卧薪尝胆，三千越甲可吞吴。”李真真仔细阅读，好像看到了楚霸王破釜沉舟，大破秦军的壮烈场面；又好像看见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灭吴雪耻的历史情景。想到蒲松龄落第后志不消沉，创作了《聊斋志异》。正是“事事难成事事成的最好注释。姑娘请郭老题名，郭老写上了“郭沫若，六二年秋”。姑娘一见惊喜万分，表示要永记教诲，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勇前进。李真真还大胆作诗谢郭老。诗曰：“梵音洞前几徬徨，此身已欲付汪洋。妙笔竟藏回春力，感谢恩师救迷航”。

6、要永远保持谦虚谨慎，不骄不躁的作风。得志了，不要忘乎所以。我曾给孩子写信说：我家三代奋斗，积于今七十年矣，吾父黄浦精英，天不佑之，吾等读书聪颖，时不合之；你们幸运，适逢邓小平拔乱反正，有了平等竞争的机会，得以出人头第。我隐约觉得，儿辈今天的成就，是几代人努力奋斗，感天地，涕鬼神的报应，非全是个人的能耐，因此，要富不淫，贫不移，胜不骄，败不馁，父亲军校毕业回来，从渭南雇一洋车（人力车）拉到村口，提着箱子铺盖进村，别人问他：“为啥不坐到家门口”，他说“大人骂哩!”李俊彦官至少将师长，李玉亭也少将军衔，见了村里人哥长哥短，一点架子也没有。真正有本事的人，大都外圆内方，不扎势，不张扬，我也看到一些人，发达了，有权有势，吃喝嫖赌，胡作非为，那他快了，快完蛋了。耶稣说过：“上帝要你灭亡，会先让你疯狂。”记住：“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”。“穷蹇忧愁富蹇誇，打墙的板板翻上下”。

7、不必加入任何宗教组织，也不必参加任何封建迷信活动。“佛是做的，不是说的；佛经是行的，不是念的”。心中有佛，自觉做善事就是了。凤莲家三代单传，寡妇养儿，祖母给全家报名加入一贯道，为的是求神保佑，人旺寿长。结果折财殒命。很多宗教组织，下层并不知道上层的政治目的，糊里糊涂跟着犯律条，一定要吸取这一血的教训。

8、再忙也要把孩子的教育放在首位。了解他们在学校的表现，观察他们的一言一行。培养他们做“有理想，有道德，有文化，有纪律”的四有新人。千万不能溺爱，不能护短，不能娇生惯养。不能让孩子乱花钱，大手大脚，挥霍无度。一旦私欲不能满足，会要父母的命。古人云：“贫寒出秀才，富贵出骄子”。我的孩子走上社会，我能放心得下的是，他们什么苦都能吃得，他们不会吃喝嫖赌。幼年清贫的生活，倒是终生取之不完，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。教育孩子成才是人生一项伟大工程。只有把孩子培养成人，后半辈子才能安宁，704厂曲书记深有感触地说：“人到老年，幸福不幸福，这个主动权不在自己手里掌握，在儿女手里掌握”。

9、我主张厚养薄葬，生老病死，乃自然规律。在世行了孝，死后须节哀。因为问心无愧，心地坦然。在世都不孝，死后何必哭？哪来恓惶。我反感生子满月，老人“三年”，大操大办。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父子。谁知道儿子将来是忤逆还是孝子，若是忤逆，岂不费心越多，伤心越重。老人过世已三年，慢慢淡忘了，何必劳民伤财。别人还会骂：“在世不孝，死了胡闹”。有的人当了官，发了财，婚丧嫁娶，大操大办，一是为了炫耀；二是为了敛财，都是不正之风。我认为婚丧嫁娶不攀高，不就低，操办到中等水平最好。老人过世，儿女离得远，不必专程回家。人都死了，看一眼尸首有多大意思？还不如就地焚香烧纸，虔诚祭奠。老人在天有灵，也感慰籍。以后有机会回故乡，祭坟也不晚。

10、爷爷临终，嘱咐风莲把家给他看好，可见对这片地方感情之深。我只是守住了基业，没有发展，盖了三间门房，算是把庄基看住了，前年到机带厂杨灵泉（张义村人）家谝闲传，他爱人是我家的北邻居女，乡当加邻居，随便谝，他说："听说你把房盖了"。我说"盖了。盖房的时候，娃不同意，问我给屋里盖房干啥？我说，在那儿死呀！"他俩笑了，我接着说："咱们都是当地人，将来死了，还得埋在家乡，这叫落叶归根。娃把骨灰盒抱回家，打墓呀，埋藏呀，待客呀。有那一片地方，多气强。没有那一片地方，村里就把你不当村里人看待了，两个人不可能一起死，先死一个，骨灰盒放在家里，不过事，再死一个，一起埋葬。我才不把骨灰盒寄存在火葬场哩！再说，渭南城市建设，一个劲向西发展，我们是近郊区，留给儿孙，根据需要，再去修建，我把爷爷、爸爸、妈妈的照片，放在老家，闲暇回去看一眼，寄托哀思；烧一柱香，感恩戴德。村里走走，说说闲话，河滩逛逛，看看风景。院子有花有树，多么惬意。那片地方也卖不了几个钱，我们也不是揭不开锅非要靠那几个钱救命，还是先留着好"。他俩同意我的观点，也把老家的房重新翻盖，收拾了一番。我认为，再穷都不卖庄基，除非政府有硬性文件要没收。

## 后　记

我写以上文字，一是给祖先、儿女有个交待。二是闲暇阅读，褒念君子，鞭鞑小人。三是让儿女知道我们受的苦，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2005年5月于加拿大纽芬兰圣约翰斯

附：诗二首

98年秋，盖房时，睡在阴冷潮湿的毛坯房下，看摊子，感慨万千，夜不能寐。吟诗一首：

## 修房言志

祖父终生住小房，　父亲英年台湾亡。
承继祖业愧发展，　搜废利旧盖门房。
子孙珍惜争维修，　尔住汝让莫卖拆。
闲暇回乡祭先祖，　追昔抚今满院春。

## 二

男人要把好“酒色财气”四道关，录诗一首，警钟长鸣

## 酒色财气

饮酒不醉最为高，
好色不乱乃英豪，
不义之财君莫取，
忍气饶人祸自消。

First Row (L-R) - Fenglian Li, Zhongyi Li

Second Row (L-R) - Na Li, Weiying Li, Weibao Li, Weilin Li, Baocheng Li